

作家访谈

只要进入写作,我的心态就是沉潜的。我的先天里的略略自我封闭,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天然不适,都对后来我的写作起到非常好的凝神作用。我的诗情的旺盛,确实是不常态的不日常的。也许这样的人的命运就是一生独行,超脱却也深谙世事,摒弃一切芜杂。所幸命运允许我如此的奢侈——只是去写,把我能够知道的、好的心思码成文字。

张好好:潜心写作,让生活慢下来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同气相求”用于文字的相逢也很恰切。比如遇见张好好。她热爱文学,先就有了足够可聊的话题;她又喜欢电影,更爱的是从她《好电影 好古诗》那一长列的名单里,见着熟悉的影片,他乡遇故知般地,迫不及待地翻阅下去。

我想探知的,不只是她对影片有多么深刻的见解,也不只是多么诗意优美的文字,而是,张好好看了什么。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她说:

在很难的时候,那个对的人蓦然出现,并一直守护在你身边,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运的了。所以蒙冤入狱的杜佛伦怎样与典狱长斗智斗勇并把吝啬鬼虚伪冷酷的典狱长送上公正的判决之途,当然不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去看看爱是怎么回事。看看爱是赠送给何人的礼物。我们就要做那样的人。

爱。感恩。向善。纯粹。安宁。我好像看见张好好,看见她平和从容地看待并书写自己的故事,看见她坐在夕阳映照的沙灘上,抱着膝盖,欣喜满意这美而丰饶的星球,无处不在的光感——这光是由牵念和爱的慰藉组成,她也坦然而喜悦地继续着她的存在。

中华读书报:你的叙事节奏非常舒缓,从容,那些朴素的甚至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在你的书写中,诗意又令人回味。

张好好:只要进入写作,我的心态就是沉潜的。我的先天里的略略自我封闭,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天然不适,都对后来我的写作起到非常好的凝神作用。我一面敬爱人间,一面能够轻松地分辨并摒弃

其中的冗长沉渣。之所以叙事节奏舒缓从容,那是因为我爱着人间的优美。每天我行走着,看见,感受到,沉思,体悟造物主的用意,怜爱生灵的坚毅和无欲。此种视角和思维状态锻造了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这语言没有诀窍,只是温柔敦厚地去爱。

中华读书报:你很擅长小人物的书写,比如对做饭的大师傅的起伏人生,比如新娘子平静又令人好奇的生活……这些人物的书写,是根据记忆的点滴?他们是如何跑到你的笔下的?

张好好:我们不会白白地来到这个世界一趟。如果我们天赋只是写作,那么往事不会随风,自诞生时五官响应人间万物万事的一霎那起,它们,光影冷暖的混响,就与我们流动的脉管一起构建起了一种生命。它们会用悄然的身姿刻写在我们不离不弃莫失莫忘的心灵上。是的,这些小人的样子,一举一动,一思一行,都是我记忆里的可亲可爱。我从遇见他们,三五岁,七八岁?他们就住进了我的心里。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们值得怜爱。因为爱,这保存就真切。写的时候,就急迫。写出来——我的心这样告诉我。

中华读书报:《布尔津光谱》描写少年时光令人怀念。

张好好:说到童年,想到的就是大风,和6月才缓缓到来的黄色蒲公英。我们在15岁以前,每天都在风里跑。布尔津,祖国最西北的最顶端,友谊峰山下,有壮丽的往北冰洋流去的大河。我们每天在

河边走。

混沌未开,就是我们的童年,朴素的衣着,勤劳的家务劳作,分享辛劳的手工业劳动者的父亲和母亲的快乐和忧伤。生活的重担,也压迫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上。然而,欢快总是很多。放声大笑,深夜里去到院子里看满天的星星,觉出天地的高大和神秘幽邃,和小动物们一起长大,心里涌动着纯净的爱,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素养。

中华读书报:你对于写作的爱好来自什么?

张好好:我记得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就如饥似渴地读家里订购的唯一一本杂志——《父母必读》。十二三岁偶然遇见一本翻得很旧了很厚的杂志,大约是《收获》。里面有一个讲麋鹿的长篇小说。我在厨房的劈柴的火光里读完,内心震惊。还读过一个好的台湾生活的小说,里面有仙草和甘蔗这样的水果,也是读到不能自拔。几乎每次读完一个好的小说,就有缓缓地回到人间的回神感。少年时代,读到《席慕容和罗兰小语》,三毛和张爱玲。青年时代,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去新华书店买了山东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家散文集上中下卷。这些举动都是自发的,没有受过谁的影响。大约觉得生活的滋味,若沉陷其中依然是比较单一乏味的。而阅读令我的精神被洗涤被高扬,世界除了大自然的丰富,还用另一种阔大,给我力量。

中华读书报:你的写作完全是自然生长的状态?没有上过任何

写作班、培训班?

张好好:是的,完全是自然生长。2001年从第一篇散文开始,每天写作,读书,再也没有看过电视。直到2008年10月,由新疆作家协会选派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这次的学习对我来说,世界的门豁然打开了。

中华读书报:能对自己的散文创作做一些概括吗?新疆的作家,比如刘亮程、李娟、阿舍等,各有独特的风格。你们互相之间未见得认识吧?

张好好:我很喜欢萧红对生活的态度,和下笔的聪慧和灵动。也读张爱玲的散文,她的老道和天真也是可爱的。黑塞的《童年》是我最爱和最能忘记的。我在自己的散文中会吃住一股劲,拒绝轻浮和刻意迎合读者的口味。

我非常热爱刘亮程的作品。写大风,写一个人骨头里的寒冷。他懂得新疆,懂得土地和人,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之一。我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李娟和阿舍的书都责编过,彼此也认识。李娟的散文充满山野的跃动,她是为数不多的深入生活的写作者。阿舍有维吾尔族的血统,但她的散文是完全的汉人表达,睿智,成熟,非常善于捕捉环境和人的共生融合感。

中华读书报:你从不写迎合性的作品。这种写作定力从何而来?

张好好:一转眼快20年了。它从何而来?是个性使然吧。倔强?但似乎自己又是温柔似水的。那就是我太知道什么样的事物和精神是长久

存留并对人间有益的。这个是必须恪守的写作前提。

中华读书报:读了《故乡以北是西伯利亚》《你好啊,森林》等诗歌,感觉你的创作越来越趋于成熟,但是成熟有时候与激情成反比,你是如何一直葆有这样的诗情?

张好好:有一种成熟是人性的世故和对于技法的偏爱与投机,它和激情成反比。有一种成熟是渐渐悟性更了然,内心的修养更平静,怒而不怨,温柔敦厚,这也是古代最好的诗歌的特点。

我的诗情的旺盛,确实是不常态的不日常的。也许这样的人的命运就是一生独行,超脱却也深谙世事,摒弃一切芜杂。所幸命运允许我如此的奢侈——只是去写,把我能够知道的、好的心思码成文字。《故乡以北是西伯利亚》《你好啊,森林》的创作动机依然是依着道学的出世,矫正世人太入世而陷入的浮靡和空虚。

中华读书报:《故乡以北是西伯利亚》的创作是一气呵成吗?可否谈谈这一作品在你的创作经历中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张好好:是一气呵成,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首接一首完成的,这期间我只专注写这部作品。它具有独特的意义,是方向的定位,代表一种确定性。我自那里来,将来还是要去那里。诗歌的确定性我向来认为非常重要,诗歌是坚守,所以要明确立场和观点,这是一个诗人的使命,因为我们在传播文化,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新



《也儿的石河 流过布尔津》,张好好著,重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5.00元;《禾木》,张好好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2.00元

疆往西伯利亚的方向,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它本身所富有的一种高蹈纯洁的精神,令我热爱,终其一生沉溺其中,这也是信仰吧。我就是在这些越来越清晰的信仰里树立起我自己,从而愉快地去表达。

中华读书报:《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的出版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好好:这本诗集是我的诗歌道路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意味着8年来的诗歌创作终究留下了我的想法,我的愿望。我希望世界会好起来,人心能够更无私,懂得大自然的语言,只有大的美德,只有大自然能教育我们。

中华读书报:201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禾木》,以你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一个宏大的主题:“整个人类,必将用自己的毁灭,偿还亲手毁灭众生灵这不可推辞的事实,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发展史。人的心可以坏到见了生灵就杀害。”处理这样一个主题,有难度吗?

张好好:有难度。人人逐利那是危险的,是万劫不复的。我必须解剖,我的,父亲的,母亲的,我必须公正,不得掩藏那罪与罚。

洛朗·比内的最新小说《语言的第七功能》也许就是从广为人知的“作者已死”高论获得灵感,让小说从巴特大师自己的“奇怪死亡”开场,运用侦探小说的熟悉套路,由警察与学者联手办案,追查杀死了当代小说和文学的“元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充分表达了他的核心质疑——语言学理论真的如此重要吗?

符号学大师之死

应舒悦

法国作家和评论家罗兰·巴特在国内文艺评论圈内有一定的名声。其实,自公元184年“作者已死”论被解释为“符号学理论”或勾勒“文学科学”之轮廓的“结构主义学说”。洛朗·比内的最新小说《语言的第七功能》也许就是从广为人知的“作者已死”高论获得灵感,让小说从巴特大师自己的“奇怪死亡”开场,运用侦探小说的熟悉套路,由警察与学者联手办案,追查杀死了当代小说和文学的“元凶”。这么

个沉重故事,在作者笔下却异常欢快。甚至主人公西蒙还一度怀疑自己是被困进了一部小说里。大量的学术术语堆砌和符号化的描写,外于刻意而又凌乱的场景塑造,使小说读起来充满反讽,积累丰富的读者会不断地若有所思,会心一笑。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充分表达了他的核心质疑——语言学理论真的如此重要吗?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文艺理论界的大事。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新批评派,到

结构主义、符号学,再到解构主义,层出不穷的理论从各个方面突出了语言的中心地位。理论代表人多为法国学者,法国学界也因此颇负盛名,并引以为荣。由是,洛朗·比内作为法国当代文学的教师,他的批判和反思确实很有反叛性和现实意义。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当今法国,文学和哲学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哲学是哲学,文学是文学。然而注重“科学性”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追随者们占据着法国的教育

决策机构,这些理论研究脱离了哲学内涵,被死板地应用于青少年的教育。这大抵是造成当今法国难以出现优秀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有意重新理解历史和小说、生活和理论的关系之后,作者的意图就是希望将小说、文学拉回生活世界,走出理论的怪圈。所以说《语言的第七功能》是一部妙笔生花的好小说,读者不妨在闲适的午后,泡一杯浓茶,慢慢品读,领悟其中才学兼备的真知思索与人生故事。



《语言的第七功能——谁杀了罗兰·巴特?》,[法]洛朗·比内著,利和、黄雅琴译,海天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48.00元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具有人生宝典意义的一部不同凡响之作。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

李国文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止,通常被称作“三国”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奸贤愚、风云变幻的历史,如此家喻户晓,以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多,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志大奸,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籍中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更有讲史的习惯。从宋代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的“斜阳古道起家庄,负鼓翁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候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于是,明代就有了在话本基础上修改加工、凝练完善,雅正文字,拾遗补缺的《三国演义》;至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正式定型,后又经毛宗岗父子润饰,便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印刷数量之大,读者受众之多,普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

深,在中国自有书籍以来,为当仁不让的出版物冠军。

凡中国人,在其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交往言谈、工作学习之中,都会因涉及这部伟大作品,而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存在。

政治家谈它的权谋,军事家谈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为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一。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在中国,不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多,在国外,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少。一部书,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于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的小人能从中找到知音,胸怀坦荡的君子自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 兴灭

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部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 浩浩哉,荡荡哉,谈《三国演义》,如人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有人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这样提供了如此之多炉火纯青的权术,展现人性之恶。也有人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感情用事,而错失眼前的现实。在中国,还找不到一本书,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如此密切。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这部书对于三国时期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敬为尊神,得享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与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白话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

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部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绣像插图,本是章回小说的传统手法,其直观效果,其视觉冲击,往往对文本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本书从清末民初的多种版本中,撷取优秀插图,以求图文并茂,使读者得以享受文字以外的美感,这份用心与努力,希望得到读者赏识。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举不胜举。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当作美行,把反动视为进步,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统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也就自然成了群氓和蝼蚁。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者,或是

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弥布网络的粗制滥造,胡编乱写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的对象了。

《三国演义》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被认为是“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视作“野史荒渺之谈”“崔嵬隳聚行径”而“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大有人在。它确也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说书艺人和历代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某种意义上的实用价值。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



《李国文说三国演义》,李国文著,万卷出版公司2017年5月出版,128.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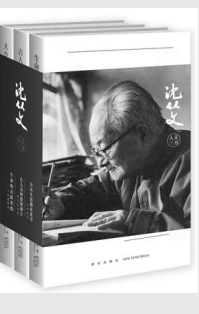
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精品。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具有人生宝典意义的一部不同凡响之作。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本版推荐

“沈从文·人文三书”,沈从文著,刘红庆编,新星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160.00元



公众对沈从文先生的了解,仍局限于几本代表作。他身后出版的洋洋几十卷《沈从文全集》,只是少数爱好者及研究者的收藏品,人们并不知晓其中蕴含的价值。在文学创作之外,先生为数甚多的随笔、检讨、书信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精神空间。由沈从文、刘红庆先生编选的“沈从文·人文三书”,将作家小说、散文之外的文字介绍给读者。《生命的光影线》呈现的是作为思想家的沈从文的面貌,他对人生与命运的哲学思考,予人以特别的启迪;《古人为什么要留胡子》是一本谈艺论文录,涉及创作心得、艺术的功用、美的教育以及对文物演变的阐发,另辟蹊径,发他人所未发,可谓美的发现之旅;《大小生活在念中》是先生在动荡岁月里写的家书(1966-1976)。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因传达了作者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弥足珍贵,既是了解作家情感与思想的上佳读物,也是了解那个苦难时代的可靠读物。